

第五章 在东南亚看到的中国形象

第一次作为特派员去东南亚

话题稍微跳一下，在这儿我想简单讲一下自己第一次作为长期驻外特派员时的体验。

1968年10月，当时的国外通讯部部长渡边敏对我说，“曼谷的分社关闭后，还要暂时关闭雅加达分社。你去新加坡开设新的分社，跑东南亚各地吧。”

首访印度尼西亚

跟现在不同，当时海外分社还很少。在东南亚，只有报道越南战况的西贡分社，和设在西亚印度的新德里分社。这次的“赴任”值得感谢，但这么重要的任务是否能完成，说实话，真是感到有点不安。但大家都劝我说，“人生到处是青山”，于是我就飞往了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

印度尼西亚人口超出日本，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正值雅加达分社关闭，有必要一定要见一下印度尼西亚负责对外关系的外交部长阿达姆·玛利克，请他在今后的采访报道方面，提供协助。

但要求会见的申请已递上去五天了，还没有回音。没办法，只好求当时驻印尼的八木大使帮忙，可大使说他两个星期前递上去的会见申请，现在还石沉大海呢。

于是我下决心去找负责安排与玛利克外交部长会见的外交部情报总局长。他指着桌子上堆积如山的会见申请说，最快至少也得十天。真是到了穷途末路了，但我还是气馁地交涉。总局长再一次仔细地看了我的名片，问我，“吉田先生，你跟那位有名的吉田首相是什么关系？”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啊，对了，他是我的祖父”。他看着我的脸，又问是不是真的。我不避开他的视线，眼神里断言，“那还有假？”当然我跟首相并无“血缘关系”。但祖籍同是高知县，可以说有“地缘”关系吧。

“请稍等。”总局长说完就离开了座位。十分钟左右以后，他返回来，笑咪咪地对我说，“明天上午10点，请到这儿来。”

从那以后，每次去雅加达时，玛利克外交部长即使是有重任在身，都与我会见，透露一些重要的情报和暗示，在各方面对采访给予了协助。

以新加坡为据点

离开雅加达后，我来到新加坡。先暂住在饭店里，开始为开设成为今后采访据点的分社到处奔波。当时在新加坡只有共同社和时事社的分社，日本报社的据点一个也没有。我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要找到一处即能最快收集东南亚各地的消息，又能方便地与东京总社进行联系的据点。

我首先去了跟朝日新闻社关系很深的路透通信社驻东南亚的总局。当时的局长叫基米·汉，是一个韩侨，一看就是一位精悍但细心的人。经过交涉，他爽快地答应把总局的房子让一间给我们。在总局长的手下，包括编辑、采访记者、计算机打洞员一共有五十多个人。

在这儿，可以及时收集到范围广泛的亚洲各地的消息，包括越南局势方面的，还有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老挝、柬埔寨、澳大利亚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的。跟东京总社的采访联系，通过跟路透通信社签定的“特别合同”，进行得也很顺利。

下一步的工作是，要做到在东南亚的范围内如果发生了什么大的事件，能说走就走。当时，每次离开新加坡去其它国家时，都要申请回新加坡的“再入国签证”。申请那个签证一般都要花一天时间，因此我觉得有必要申请新加坡政府给我们签发能多次自由出入国的签证。在管理严格的新加坡办这手续真不容易，但幸运的是考虑到是新闻局，一个月以内就批下来了。

华侨与华人的不同之处

对我来说，在新加坡还有一点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国家虽说是一个中国籍、马来籍、印度籍的“复合民族国家”，将近有百分之七十五是中国籍，中文（华语）可以通。从福建、广东等省来的“华侨”（借住海外的中国人）很多。

刚开始，我认为他们肯定会说自己是中国人。但他们却异口同声地说自己是“新加坡的华人”。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其他东南亚诸国也是同样的说法。真正理解他们的心理我还真花了一段时间，不过只要重新回顾一下第二次大战后在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出现的历史大变迁和相互的磨擦，也不难理解这些人的心情。关于这一点，后面有机会再叙述。在这儿要说的是，与“华侨”区别开来使用的“华人”，是指离开中国在国外定居，并取得居住国国籍的中国人。

速飞巴基斯坦

分社开设后，住的地方也定了下来，工作也慢慢走上了轨道。转眼到了69年3月下旬，家人也从东京来了。但就在分别了三个半月再会的那天傍晚，东京总社来电报了。

“巴基斯坦形势不妙，可能要发生政变，速飞卡拉其”

新德里的特派员不巧去阿富汗出差了。这可是大事。把刚到的妻子和岳父托人照顾，拿起有关巴基斯坦问题的资料文件，我就坐上了当晚的飞机。

第二天早上，从在卡拉其住的地方给总社打了电报，然后去日本领事馆和大商社收集情报。原来是就收拾国内的混乱局面，阿由布·甘总统和布托外交部长间发生了激烈的政治争论，但没有要发生政变的紧急事态的动向。刚想把这个情况跟东京联系，回到饭店一看，东京又来了电报。

“情况紧急。马上与布托氏会见。”——这是不容分说的命令。东京和现场之间在感觉上的不同使我感到困惑，但我还是开车马上来到了布托邸。

布托氏身材魁梧，皮肤黝黑。听到来意后，他爽快地把我让进了会客室。他刚开始批评他的政敌阿由布·甘总统，他的大儿子就抱着收音机进来了。听了用旁遮普语广播的新闻后，他突然说，“发生政变了。军部掌握了政权。阿由布·甘恨我，把政权转让给军部了。我什么发言权也没有了。这次会见就当没有发生。”

我一时目瞪口呆，只说了一句“政权转让军部的消息是从您这里得知的，这一点希望能让我们写出来。”就跑了出去。

直飞悉尼

用日语写的罗马字把政变的第一消息打好后，就拿到电信局去发，但那儿已开始了严格的检查。负责发报的人说“意思一点儿也不懂，”要我翻成英文。简直是花费两道工夫，浪费了一个小时。接着，打电话接通了东京，一些烦琐的地方刚用日语一说，就听到被监听的电话那头有声音，好不容易才接通的电话“咔嚓”一声就给切断了。

这下可糟了。下一步能用的手段就只能依赖一家大综合商社的专用电传了。幸运的是那儿没人知道，所以没有被检查。

从第三条报道开始就顺利了，而且可以用日语发稿，真是帮了大忙。由于只有朝日新闻社是在政变前就飞到了现场，所以遥遥领先了事发后才蜂拥而来的其它报社发出的消息。

当时，巴基斯坦分成东西两部分。我从西巴基斯坦的卡拉其，伊斯兰堡飞到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的达卡，进行了连续不断的采访。

根据自己的判断，在雅非阿·甘地将军就任大总统的军事政权下，巴基斯坦的局势已开始走向稳定。于是我把总结的稿子发出去后，就准备回到采访据点新加坡去。

这时，从东京又来了电报。

“辛苦了。采访很好。”可接下去是“亚洲开发银行总会后天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召开。日本的大藏大臣福田赳夫也要出席，东京就不派随行记者了。你直飞悉尼，采访总会情况。会议结束后与福田大藏大臣坐同一班机，在机舱内进行采访。”

我这东南亚新任特派员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

“人种骚动”的冲击和教训

在新加坡开设采访据点后，作为东南亚的移动特派员，我最初碰到的冲击性的事件是发生在马来西亚的由于大选引起的“人种骚动”。

马来西亚大选

在复合民族国家马来西亚，构成两大种族的马来籍（占百分之四十三）和中国籍（即华人，占百分之三十三）之间由于对立造成了死伤者达五百人的“流血惨案”。这次事件给拥有华侨及华人社会的其他东南亚国家很大的冲击。对负责中国问题同时又负责范围广泛的亚洲问题的我本人来说，也是一次极富有教训的事件。

1969年5月10日，以马来西亚全国（西马来西亚、纽巴，萨拉瓦克）举行的十二年以来的第一次大选中，被称为“建国之父”的拉曼首相领导的执政党联盟党，取得了胜利。这个联盟党是由马来人组织的统一马来亚国民组织（UMNO）马来亚中国人协会（MCA）马来亚、印度人会议（MIC）等组织构成的。

产生新的矛盾的主要因素是，以中国籍市民（华人）为主体的在野党，民主行动党（DAP）及马来西亚人民运动党（MPM）取得了大量的议会席位。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各人种的绝对平等性”。对执政党联盟党口头上说“复合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繁荣”，但在规定的各个方面却采取“马来人优先的政策”的做法一直是提出抗议。民主行动党（DAP）从一个席位一下跃到占有十三个席位，马来西亚人民运动党（MPM）第一次参加选举就获得八个席位。这也反映了华人的长年不满。

结果，执政党联盟党成员之一的马来亚中国人协会（MCA）却惨遭败北。MCA 会长兼财政部长的唐·秀新氏虽然当选，但 MCA 的三十三名候选人中的二十名落选，原四名内阁大臣中有两名也是榜上无名。

气势上升的华人在野党

华人社会分成两大部分。参入执政党的 MCA 提倡的是“钱包高于政治”，在野党的 DAP 和 MPM 却要求“各个民族机会均等”。在大选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国籍市民选择了后者。

选举结果给 DAP 和 MPM 的支持者很大的鼓舞。他们陆续来到西海岸的主要城市。有消息说，他们 13 日要在吉隆坡举行“庆祝旅行”。针对这种局势 MCA 的唐会长说，“我们在选举中败北，说明了中国籍市民的大部分拒绝把中国籍代表选进政府”，他戏剧性地这样宣布以

后, MCA 的成员就不在内阁及中央和地方各政府部门担任要职。

这给马来籍人很大的冲击。拉克副首相（后为首相）表示支持唐会长的声明，并说，“引发这种事态的责任在野党的华人方面。”他的发言在马来籍市民的感情上是火上加油，特别是给 UMNO 的鹰派及以建设回教国家和以马来籍人优先为目的的宗教色彩极浓的全马来亚回教徒党（PMIP）强烈的刺激。这些人在大选后，陆续来到首都吉隆坡，极力主张“马来籍人的权利”。

大选后，我把若干的分析写成文章发给了东京总社。对在称为“东南亚的优等生”的马来西亚，对立会发展成为悲剧性的“人种冲突”这一点，我没有预测到，真是失算。

5月13日晚上，发生了与我乐观预测完全相反的流血惨案。

第二天，我飞往已发出了“紧急戒严令”的吉隆坡。但交通已完全瘫痪。从首都机场到市区的二十公里的路程，走了四个半小时。沿途一片漆黑，一个人影也没有，一种阴森可怕的寂静。骚乱后留下的汽车残骸渐渐可见，村落的熊熊烈火还在燃烧。

一到饭店，就听到电视里播出的死者三十九人，负伤者一百一十四人的消息。说死者超出了一百人完全是谣言。拉曼首相通过电视向全国人民呼吁要保持冷静的那副悲痛的表情，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站住！中国人”

第二天，我利用刚解除戒严令的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到受害最大的“堪棒·巴鲁”地区。跟我一起从新加坡来的共同通信社的分局长松村（现已故）与我同行。邻接马来人居住区的华人街已被烧成一片漆黑。走进马来人的村落时，只见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正在为防止华人的报复进行巡逻。

我把这情景拍下来后，正准备往回走时，只听到背后有人在喊“站住！中国人”。我回转头一看，只见是三个骑着摩托车的马来籍青年。其中一个高声说，“跟我走”。我们被带到村落的总部，不一会儿就被手持刀枪的几十个马来人围了好几层。人群激奋，怒声冲天。马来语我只懂片言只语。但从他们的比比划划中知道了他们是在说：

“这儿是我们的村落。一个中国人都不准进来。”

但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而且糟糕的是，由于在申请采访记者证，护照也没带在身边。心想听天由命吧，这时平时准备的一句马来话突然冒了出来。

“我是从日本来的新闻记者。”

刚一说完，包围层里一位上年纪的人站出来，用流利的日语问我，“你真是日本人吗？”我回答说，“当然是啊”。于是他用马来语开始向他的伙伴作解释。杀气冲天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

危机意识和欲求不满

我们一会儿就被“释放”了，但“这儿是我们的村落”这句话却盘旋在脑子里，无法忘掉。

到另一个马来地区“堪蓬·半丹”的时候，一位中年人说，“就此下去，二十年以后，不，十年以后，马来西亚就要落到中国籍人的手里了”。这使人感到，马来人对已经掌握了经济实权的华人有一种在政治上也会被打败的危机意识。

我们还悄悄地潜入了百叶铁门紧锁着的华人街。与掌握着军队和警察的马来人不同，他们手里没拿武器。但在暗地里，他们准备了铁棒和刀，还有把铅水管锯断把头削尖做成的武器。一些年青人说：

“为什么不承认中文是官方语？为什么不承认中文大学？为什么在上学和就职时歧视我们？”

“嘴上说复合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繁荣，但马来人一直是优先，中国人和印度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一直受到压抑。”

意在保护根深蒂固的传统和文化的中国籍市民的大多数，所执着追求的也是这一点。

听着双方各说各有理的意见，我心里充满一种前途难卜的感觉。

“中间人”的重要作用

在不断采访的过程中，一位偶然相识的华人小伙子的行为强烈地吸引了我。他奋不顾身地投入了在暴动中负伤人员的治疗活动中。他把手术要用的氧气瓶和葡萄糖送往各地的医院和医疗所。在发布了禁严令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件冒死的工作。不管是收容着马来人伤员的医院，还是有华人伤员的医疗所，他都照样把东西送上门。

20日的流血惨案被平息后，我正在难民收容所采访，突然有人拍了我肩膀一下，我回头一看，是那个华人小伙子。也许是睡眠不足，他眼睛有些红肿。他对我说，“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马来籍人和中国籍人要真心相通”。

在宗教、传统、文化，生活习惯各自不同的异民族不同人种交往的过程中，他在努力追求一条并非“你死我活”，而是“携手共存”的道路。他那种了不起的“中间”的精神，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结束了马来西亚十天的采访，我没返回新加坡，而是飞到了雅加达。我想去会见一下精通东南亚情况，特别是跟马来西亚领导人有着深交的印尼外交部长阿达姆·玛利克。外交部长很爽快地为我抽出了时间。他先叮嘱我说：“这绝对不能公开哟”，然后说“我希望拉克副首相不要太坚持马来籍人的立场。过些日子，我直接与他会面，谈谈我的看法。”

这种大局观念和权衡感觉，以及对盟友的深思熟虑，使我很受感触。用文字写出来，这还是第一次。

美国的变化和东南亚的对应

从 1968 年 11 月到 70 年 10 月在新加坡驻在的这两年的时间里，东南亚区域最大的焦点仍然是以越南战争为中心的印度支那局势的去向。但是，围绕着这个地区的国际环境，已开始出现了重大变化的兆头。

不再火中取栗

“对我们来说，1968 年是冲击极大的一年，美英两国已经不再会火中取栗了吧”。新加坡的拉家拉托南姆外相（当时）在 1969 年的元旦作外交方针讲演时这样开头道。这段话现在我还记得，真是把东南亚各国首脑的内心话表达得恰到好处。

1968 年是美军飞机停止对北越轰炸的一年，是在巴黎开始进行越南和平交涉的一年，也是约翰逊总统下台的一年。同时，这一年英国声明英军从苏伊士以东撤退。美英两国长年凌驾于东南亚所作的保证突然让人疑问重重，也是这一年。

果然，就任美国新总统的尼克松氏不久就亮出了他们部署。最初的征兆是表现在他的访欧中。69 年 2 月下旬，历访西欧五国的尼克松总统，在此期间，与法国戴高乐总统会见了三次。法国曾是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旧宗主国。而且戴高乐总统是西方首脑中跟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有着深交的人物。

关于这一点，《世界日报》的著名记者，罗伯鲁·基兰，在过后打了如下内容的电报，意味深长：

“戴高乐总统从尼克松总统那儿感到意义重大的有两点：①尼克松要把美军从越南撤走；②尼克松不管道路有多复杂艰难，也要让中国参加联合国，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尼克松外交原则

尼克松总统此后打出的划时代的政策是 69 年 7 月 15 日在访问亚洲诸国前，在关岛发表的即所谓“尼克松外交上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的基本构想是“美国履行与各国制定的条约，但所有的国家应有民族自决的原则，解决纠纷、保障安全等最主要是要依靠各国的自主性。”

与此同时，对华开始采取接近的政策这一点也不可忽视。在尼克松总统即将访问亚洲诸国前的 7 月 23 日，美国政府表明：①部分解除对中国贸易的制限；②放宽对联邦议会的议员、新闻报道部门、教师、学生、医生、科学工作者，美红十字会代表等的中国旅行制限。

结束了对亚洲诸国的历访后，尼克松在接下去的罗马尼亚的访问中，改善对华关系的意义更加明显。当时罗马尼亚国家评议会议长（国家元首）齐奥塞思库，虽然是属于苏联和东欧圈子，但对苏联入侵捷克（68年8月）进行了批评，并极力主张，要走独立自主的路线，跟中国进行协调。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在“尼克松外交原则”下，美军已勉强强地开始从越南及泰国等地撤走，包括战争“越南化”，美国在亚洲的战略转换的确在开始进行了。

越南战争的幕后

但是，美国从越南撤退时，打算把北越及南越民族解放战线（越共）的军事力量尽可能地给消耗掉。作为其计划的一环，美军开始对跟随北越一直抗战的老挝左派组织“老挝”所控制的地区进行狂轰滥炸。

当时老挝是由左、右、中三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中立派的布马首相是最高指挥者。但在跟越南交界的地带，“老挝游击队”，势力占上风，北越就利用这交界地带，给南越民族解放战线运送粮食和军用物资。

在越南的背后有一处被遗忘了的“后方战场”——老挝，在这儿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美军停止轰炸北越，而开始把空军集中对准了老挝。69年10月上旬，当我得知由于美军的轰炸，大量难民从老挝北部的查尔平原逃往首都万象避难的消息后，马上飞到了现场。

离开新加坡时，路透社东南亚总局局长对我说，“到了老挝，一定要与乌顿·沙那尼空将军（老挝国军总参谋长）会面”。

到了万象，我首先对难民群混乱拥挤的老挝最大的佛塔“塔克·卢安”的情况进行了采访。接着会见了跟“老挝游击队”的领导人斯法努噠殿下有着深交的布马首相。然后是采访“老挝游击队”驻万象的首席代表索多·贝多拉希氏。我还到了关押着九十四名北越军俘虏的所谓“秘密收容所”。就这样，我对发生在战争幕后的事态进行了不停的采访。

老挝总参谋长的洞察力

离开老挝的前一天，我见到乌顿·沙那尼空将军。虽然作为国军总参谋长日理万机，但他还是对我说，“今天晚上，请一定到我家里来。一边吃我妻子做的菜，一边谈吧。”

乌顿将军，脱下白天那身威严的军服，上身穿着一件短袖衬衣，下身穿着一条西装短裤。将军既不喝酒，也不抽烟，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和踢足球。我首先就问起了老挝的战局。他说，“支持老挝游击队的北越军队，这一两年，打破常规，在雨季也向我们进攻。今天夏天，我们给打得够呛。”接着，他说了自己的见解。“但最近北越的战斗部队有很大一部分像是撤离了前线。他们的精神领袖胡志明主席的死（69年9月3日），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查尔平

原的战局开始朝着对政府军有利的方向在发展，也就是这个原因。”

三天前会见的“老挝游击队”的索多·培多拉希代表在承认当前战局不利的同时，也表示了一定会打回来的自信。我把这话讲给乌顿将军一听，他笑着说，“我常常跟索多代表搞‘战争对谈’。别忘了，老挝游击队的斯法努噏议长现在还是老挝联合政府的副首相哟。我们是几个兄弟在自己家里打架。”

对了，跟布马首相会见时，他也是专门强调“北越军的存在”。相反，索多代表特别对“美军飞机加剧轰炸”进行了非难。这也许是他们互相在暗示，如果外国不介入，老挝的问题可以通过谈话来解决。

“话可以说在前头，老挝可没有美军”。将军说，“美国现在出于内外的压力，不得已要从越南和泰国撤军了。”

话题转到苏联是否会进入东南亚时，将军说，

“现在中国的事情就够苏联受的了。他在东南亚寻找盟国就是这个理由。不错，是有几个国家，由于跟中国的关系，开始在跟苏联接近。但最大的弱点是，来到东南亚的俄罗斯人也太少了。”

调整与重要国家中国的关系

接着，将军指出，调整与中国的关系不但是对老挝，也是对东南亚各国的将来是一个无法避开的大问题。

“老挝与中国国境相邻。那边有七亿人口（当时）和丰富的资源。与此相比，老挝的人口还不到三百万。”

“我觉得像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那样的生存方式是高明的。要实现东南亚的和平，有必要跟中国建立安定的友好关系。为此，东南亚各国互相协力，并坚持非同盟中立的方向才是良策。”

乌顿将军希望日本也能对他这样的看法表示理解和协助。

“没有什么招待，今天就吃老挝菜吧。”

将军夫人在一旁说。桌子上摆着醋黄瓜、土豆、萝卜和胡萝卜等煮在一起的老挝菜。跟我小时候吃惯了的家乡菜的味道一模一样。

“亚洲真正的和平与安定，不是用武器和金钱可以算得到的。我们所追求的是心与心的交往。东洋和西洋文化也不一样，对事情的看法还有不少差距。”

身为佛教徒的将军从容地结束了他的谈话。

在面对美国重大战略转换的东南亚，这是我难以忘怀的一次拜见。